

青岛大学资助出版

青岛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中心『鲁迅研究书系』之一

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

上册

郑欣淼 孙郁 刘增人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青岛大学资助出版

青岛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中心『鲁迅研究书系』之一

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

上册

郑欣淼 孙郁 刘增人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郑欣森等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623-751-9

I. 1… II. 郑… III. 鲁迅(1881~1936)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69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40 毫米×96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51-9

开本 16
印张 75.5
字数 941000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鲁迅生平研究

鲁迅生平研究二十年 ————— 朱 正 1

鲁迅思想研究

思想家鲁迅的回归之旅

——鲁迅思想研究二十年 ————— 张永泉 17

鲁迅作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呐喊》《彷徨》研究述评 ————— 夏 晔 57

近二十年鲁迅杂文研究回瞻 ————— 王国绶 周宝东 187

地火依旧在奔突运行

——论新时期的《野草》研究(1981~2001)

————— 文学武 223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事新编》研究综述

——汪卫东 熊林惠 罗贤龙 傅 梅	242
80 年代以来《朝花夕拾》研究述评	彭继媛 273
鲁迅书信研究管窥	陈漱渝 338
《鲁迅日记》研究二十年	裘士雄 366
近二十年鲁迅诗歌研究述评	鲍国华 377
鲁迅佚文研究二十年	刘运峰 405

专题鲁迅研究

鲁迅与宗教文化研究述略	李洪华 419
近二十年鲁迅传记写作综述	李红玲 魏韶华 437
近二十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述评	叶世祥 451
新时期“鲁迅与美术”研究述评	崔云伟 478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新探	
——程 翔 管然荣	500
“网络鲁迅”的回顾与展望	葛 涛 540
近二十年“鲁迅小说史学”研究述评	
——鲍国华	571
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二十年	李春林 587

鲁迅生平研究二十年

朱 正

今年是 2007 年,“鲁迅研究二十年”,上限应该从 1987 年开始。不过我不想这样拘泥,想把起点上溯到 1981 年。这一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曾经有过很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和一批研究著作,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其中就有不少传记资料。在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的传记、年谱以及涉及他生平事迹的书籍和单篇文章,都出了很多,列举起来,光是书目和篇目也可以印成一本书了。我这篇短文里,只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简单介绍一下这段时间里所出现的最重要的传记材料,以及在他生平研究中发生过争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鲁迅最重要的传记资料,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冯雪峰等

人写的回忆录,都是1981年以前出版的,不在本书预定的时限之内,这里就概不加以评论。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考证了许广平等人回忆录中的失实之处,也因为是在1980年出的书,这里也就不去说它了。

1981年出版的这方面的书,这里应该提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六十多位作者都同鲁迅有过交往,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写出了鲁迅的一个侧面,不乏颇有史料价值的材料。例如丁玲的那篇一万多字的《鲁迅先生于我》,细细记述了她同鲁迅的交往,亲切动人。又如从施蛰存的回忆文中,读者才知道鲁迅那悼念柔石等五烈士的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出来的曲折经过。

这以后发表的重要回忆文章,应该提到胡风的两篇。“左联”时期,他同鲁迅的交往不少,鲁迅在一封致萧军、萧红的信(1934年12月17日)中说他是“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关系甚深。人们只要看看《鲁迅全集》中写给胡风的那些信件,其中就有不少“私房话”,就可以知道他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了。

一篇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上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二万六千字。这是1977年胡风对《鲁迅日记》注释者所提问题的回答。当时胡风被关押在四川的监狱里,这些问题是由狱吏出面要求他写的。另一篇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上面的《鲁迅先生》,四万六千字,这是他已经恢复自由之身在北京写的了,文章回顾了他跟鲁迅交往的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写“左联”时期的那一段。有些事情,可以说是只有他才能说得清楚的。他是1936年“两个口号”之争的重要当事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胡风说:

冯雪峰到上海当天我到鲁迅家就见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四天在鲁迅三楼后房谈话时,他说“国防文学”口号他觉得不好,从

鲁迅生平研究

苏联刚回来的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似的,要我另提一个,我就提了这个口号。第二天去时(他暂住鲁迅家),他告诉我,周先生也同意了,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我当晚就写了这篇文章(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引者注),第二天拿给他看。第三天见到时,他还给我说,周先生也看了,说可以,叫我给什么地方发表出去。我交给聂绀弩和光华大学学生马子华等编的《文学丛报》(第三期)发表了。^①

又如鲁迅那篇《答徐懋庸》万言长文的成因,胡风说:

后来问题闹大了,周扬夏衍们组织大围剿,冯雪峰才请鲁迅公开答复徐懋庸,并请鲁迅声明(新口号)是鲁迅提的,请我写了文章。这是为了抵抗周扬夏衍们的攻势,好像为我解脱,其实是他自己在“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即周扬夏衍们里面受到的围攻解围。为顾全大局,鲁迅只好承担了这个责任。鲁迅在答徐文中对“国防文学”的妥协态度也是冯雪峰为了安抚周扬们提的。^②

关于茅盾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态度,胡风说:

鲁迅《答徐懋庸》文中说先由几个人商量,其中有茅盾,这也是冯雪峰把茅盾拉进来加强对抗周扬夏衍们,并不是事实。提出口号时,茅盾全不知情。只是冯雪峰要鲁迅这样提时可能先取得了茅盾的同意。茅盾看出了冯雪峰的弱点,又因以他为后台的《文学》傅东华、郑振铎们和周扬等深相结托,所以他对口号问题采取了暧昧的骑墙态度。^③

仅仅从上面所举的几个小例中就可以知道胡风这两篇回忆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史料了。看过这两篇之后,我才发觉自己原来并没有真正看懂例如《答徐懋庸》这篇文章。

第二,2001年,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评论说,此书“首先是真实地写出了伟大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海婴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朴素坦诚的叙述,不带光环地还原给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④。当然,人们都知道,海婴七岁丧父。他关于父亲的记忆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以致书中颇有一些说错了的地方。这就引起了不少的批评,批评文章写得最起劲的是秋石。2002年9月17日的《文艺报》上,刊出了他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副题就是“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万四千字。这篇文章一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7日,四开报纸《文汇报》以一整版刊出了它的详细摘要,并且加上了一个倾向鲜明的标题《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10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的“书摘”版又转载了涉及鲁迅死因的五千多字。

就在这中间,我接受过一次《中华读书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在2002年10月16日《中华读书报》所载《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这篇报道中说:

记者还电话采访到朱正先生,他认为,《鲁》书作为消闲读物来读,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作为鲁迅见证资料的书来说,则意义不大,如作为史料来看,则错误甚多了。提到鲁迅精神遗产的问题,他指出,假如图书能带给读者健康的休闲也未尝不可,不必把任何出版物都拔高到遗产的地位,但著者应对读者负起责任来。他认为秋石的文章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约是因为我的湖南口音太重,以致这位记者把我说的“鲁迅传记资料”记为“鲁迅见证资料”,“未尝不好”记为“未尝不可”了。应该说明的是,这篇在报纸刊出之前并没有应我的要求拿给我看过,在刊出之后,也没有送一张报纸给我。我是直到为写这篇文章收集材料才看到它的。对于这篇报道中所引的最后一句话,我必须说明,我只是认为秋石提出海婴书中有不少事实错误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至于他那篇长文中所质疑的两个大问题,即鲁迅死因和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我是赞成海婴的看法而完全不能接受秋石质疑的结论的。我以为,这两点恰好是海婴书中的亮点,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于秋石的文章,我完全赞同严家炎教授的评语:“自身带有根本的缺陷——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也产生了不少偏颇和失实之处。”^⑤热闹炒作一阵之后,现在岂不是已经无人再提起它了吗?

第三,《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一个亮点是重新提出了对于鲁迅之死须藤医生是不是有责任的问题。

从1933年开始,给鲁迅看病的就是日本医师须藤五百三。1936年五六月份起,鲁迅的病情加重,他的日记中须藤来诊的记载也就多了。他诊治的情形,在鲁迅致友人信件里可见一斑。

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华信:“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可知这时是把他的病当做胃病来治,预计服药七八天可以痊愈。可是过了七八天并没有好起来。5月23日致赵家璧信:“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可见遵照医嘱服药七八天之后仍不见好,医生也发觉原来诊断为胃病是不对的了。不是胃病,那么发热的原因是什么呢?待查。

在这种情形之下,5月31日,史沫特莱介绍美国医师邓恩来给鲁迅看病了。周海婴的书中说: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病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进行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

不幸的是,没有采用邓医师建议的方案进行治疗。而须藤医师又没有立刻接受邓医师的诊断结果。海婴接着说到:“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这样就耽误了病情,终于不治。

海婴的这本书中接着记下了周建人的一段话:

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

就这样,他提出了须藤医师的责任问题。

应该指出,这已经是第三次公开提出这一问题了。最早,1949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周建人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其中说到了须藤为鲁迅治病中的情形:

鲁迅病重时,也曾经看过肺病专门医生(指邓恩医师——引者

注),据那医生说:病已严重,但还可医治,第一步须急把肋膜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问须藤医生时,回答是说:肋膜里并无积水。过了约摸一个月的时间,须藤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积水。

又,鲁迅死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治疗经过的报告。可是报告里所说,与实际治疗不大符合。好像抽肋膜积水一节移前了一个时期。

除了这些医疗方面的问题之外,周建人这篇文章还提到了须藤这人的政治身份:他在日俄战争(1904年)中担任过军医。后来在上海行医,同时担任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鲁迅死后,周建人收到过交通大学一读者的来信,表示猜疑鲁迅系被日本医生所谋害。

周海婴写书的时候大约是参考了周建人这一篇的,所以两人说的没有什么出入。

第二次公开提出这一问题是在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了鲁迅1936年6月15日照的一张X光片,1984年2月22日在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开了一次“读片会”,由上海九所医院的放射科、结核科、胸科专家二十三人来读这张X光片。他们的结论刊登在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上。这篇以《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为题的报道中说:“大家认为鲁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引起死亡。”这篇报道并没有涉及须藤误诊的问题。但同年5月5日《南京日报》“周末版”刊出了纪维周的《揭开鲁迅死因之谜》,同年7月21日北京《团结报》刊出了蔡琼的《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却根据读片会的结论十分合理地提出了须藤误诊的问题来。

纪维周和蔡琼的文章发表之后,“据说,日本外交部为此向我国提交了外交照会,认为这是我国在给复苏中的中日友好设置障碍。”^⑥中国方面不愿为了这样一件事影响中日邦交,于是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以消除其后果,一是责成这两篇短文的作者作出深刻检讨,在报上发表,一是请鲁迅研究室的陈漱渝发表文章“以正视听”。陈在同年8月25日《团结报》上发表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看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笔者于8月2日就鲁迅死因问题询问了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周海婴委托笔者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看了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后,读者就会感觉到他当年的这一声明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吧。不过,日本人却是欢迎这一声明的,就在《团结报》刊出陈漱渝这篇文章的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朝刊》即以《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关于这一公案,我写过一篇《鲁迅死因“正、反、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为了否定周海婴书中的说法,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北冈正子发表《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一文。认为须藤所写病历报告和鲁迅日记不符的原因是“有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误将‘五月’写成了‘三月’。”认为这篇病因报告“如果将三月换成五月的话,有所出入的部分就能得到理解”。对于日本方面这一新的辩词,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即在《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上发表《须藤医生所写鲁迅病历为何与鲁迅日记及书信抵牾的再探讨》一文作了回答。文章在引证了丰富的材料和作了详细的论证之后指出:

无论将须藤医生所写《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的“三”月解作“五”月,或是仍作“三”月,都无法改变这份病历自身的破绽。

因为,它毕竟存在着编造。即这种编造,正是为了事后掩盖医师的误诊及对疾病治疗的延误。

以医生为职业的研究者周正章,写了《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治真相》(见《鲁迅世界》2002年第1期)等好几篇文章,以大量的材料和自己医学专业的知识,论定了须藤误诊这一事实,可以看作关于这一公案的定论。

第四,《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更大一个亮点是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和罗稷南的一句对话。这也是这本书中引起最热烈争论的内容。一时议论纷纷,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真是“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⑦。

在多篇“辩之者说无”的文章中,最早的是秋石的那篇,只是它没有提出有什么分量的论据和论点,够不上拿来代表作进行分析。最重要、最有分量的是《百年潮》2002年第9期所载陈晋作的《“鲁迅活着会怎样”?》一文,副题是“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这篇文章是“沿(周海婴的)书中所提供的线索,来看看罗稷南有没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于是就开出了一张周书中事实错误的清单。

周书中说:“毛主席……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陈晋查明:“罗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凤庆)人。”这样,他就不会出现在湖南老乡的座谈之中了。

周书中说:“90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陈晋查明,不对,罗稷南死于1971年8月。这样,周书中说的罗是他母亲的老朋友也就不无可疑了。

周书中说,这次毛罗对话,同时在场的“据说有周谷城等人”。陈晋从文献中遍查了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的五次活动:3月20日晚上,7月7日晚上,7月8日晚上,7月13日,9月17日。并查考了这几次毛会见了些什么人。他查明了“只有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有罗稷南在场,但没

有周谷城。这就够了。你不是说这次对话有周谷城在场吗?既然查明了不存在这两人同时在场的会见,岂不足以证明不存在毛罗对话的这回事吗?这也正是陈晋要努力证明的结论。他说:

既然周谷城 1957 年是否见过毛泽东都成了问题,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哪怕罗稷南不是以“同乡”身份,也很难说参加过毛泽东 1957 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至于罗稷南在参加 1957 年 7 月 7 日晚上的座谈会上,是否可能向毛泽东提出“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话题,从前面的分析中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更是清楚的:根本没有毛罗对话这件事。

这里插说一下,这一天周谷城到哪里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从 6 月 26 日到 7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代表周谷城,还有巴金、赵超构等代表,都到北京开会去了。海婴说有周谷城在场,当然错了。这个错误不难改正,删掉这一句就行了。

事实上,7 月 7 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这一活动,新华社是作了报道的。这条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闲话约两小时”,并报道了应邀出席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单。至于“闲话”的内容新华社未作报道,只说是“亲切的交谈”就是了。《光明日报》还刊出了一张新闻图片,可以看出罗稷南是坐在毛的一桌,整个画面确实也是亲切交谈的气氛。陈晋的文章里也写到了,“7 月 9 日的《文汇报》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进行亲切交谈两小时》为题报道了此事,并详列了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具体名单”,我没有去查阅这天的《文汇报》,不知道他们用的是本报讯还是新华社新闻稿。如果是“本报讯”,不知道是不是用了“围桌闲话”一语。陈晋接着写道:“显然,这次也不属于《我与鲁迅七十年》(原文如此)所述的那

场……具有聊天性质的座谈。”这里的“显然”二字稍嫌武断了一点。“围桌闲话”岂不就是“聊天性质的座谈”吗？

周海婴的这段文章确实没有写清楚，弄错的地方不少。罗稷南（本名陈小航）的侄儿陈焜有一段文章就说得清楚得多：

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1933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⑧

2002年12月，当年在场的三十六人之—的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确有其事看来应是无疑义了。

陈晋的文章想用分析周海婴书中的事实差错这个办法来证明并不存在毛罗对话这件事。这样做过了以后，他进一步提出一个新论据，来证明周海婴书中所记的那句话根本不可能是毛的意见。他说：

1957年，毛泽东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我与鲁迅七十年》（原文如此）所述迥然相异。

接着，他就详细说明了，他是指1957年3月6日至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在几次座谈会上的讲话。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就正面说到了要是“鲁迅在世”会怎样的问题。这一天毛说的是：“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

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⑨在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说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接着他说了一大段他的看法,最后归结到“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⑩。毛在1957年确实是这样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的。既然周海婴书中所记内容与这些在《毛泽东文集》里公开发表的意见迥然相异,无疑就不是毛的意见了。

要回答这个“质疑”很容易。每一个研究了有关文献的人都知道,毛在1957年3月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到7月在上海同三十六人“围桌闲话”之前,这几个月里他写的重要文章,只说在《毛选》第五卷收录的,就有:《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只要一读这几篇文章,就会明白7月和3月说法“迥然相异”的原因,就会明白毛在那时那样答复罗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前面所引陈焜文文章中说,毛对罗的提问并不是马上回答,而是想了一下才说的。据我想来,毛这片刻的沉吟,并不是要考虑怎样处理假定还活着的鲁迅,而是在考虑他要不要趁着回答这个提问的机会把他反右派的坚定决心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个信息对于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大有利益的,他于是这样说了,这才是大政治家的作风。

第五,《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还有一项引起了不少议论的内容,那就是宋庆龄和救国会是不是出了钱为鲁迅治丧。长期以来,在不少出版物中都说救国会或者宋庆龄都是出了钱的。包括冯雪峰、黄源等人都这样说过。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1972年12月25日)中就说,“棺材是宋庆龄送的,价三千元。”^⑪周海婴书中则说:“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书中还引用了参与治丧的胡风的妻子梅志的话:“说过由救国会出钱,可是后来分文未出。”又引用了胡愈之的话:“救国会当时是非法的团体,是没有钱的。”胡愈之还说了,给鲁迅买棺木,“实际上可能由中共付钱的,因宋也没有很多钱”。